

20世纪俄罗斯

档案文件

新经济政策
是怎样被断送的

(四)



人民出版社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

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
（五卷本）

第一卷 1928年4月6—1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第二卷 1928年7月4—12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三卷 1928年11月16—2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四卷 1929年4月16—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第五卷 1929年11月10—17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四卷

1929年4月16—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人民出版社

РОССИЯ XX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

Как ломали нэп.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ов ЦК ВКП(б) 1928—1929 гг.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атерик»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Фонд Александра Н. Яковлева), 2000.

© Данилов В. П., Ватлин А. Ю., Кошелева Л. П., Роговая Л. А., Хлевнюк О. В.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введение, примечания.

本书中文版版权取得俄罗斯国际民主基金会授权,由人民出版社独家出版。

图字:01-2007-0782号

责任编辑:崔继新

装帧设计:曹春

版式设计:马杰 责任校对:阎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四)/[俄]A. H. 雅科夫列夫 主编

赵永穆 郑异凡 李铁军 徐燕霞 译 朱文佩 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2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A. H. 雅科夫列夫院士 主编)

ISBN 978-7-01-006260-0

I. 新… II. ①雅… ②赵… III. 经济政策-研究-俄罗斯 IV. F15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2607 号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四)

XIN JINGJI ZHENGCE SHI ZENYANG BEI DUANSONG DE

[俄]A. H. 雅科夫列夫 主编 赵永穆 郑异凡 李铁军 徐燕霞 译 朱文佩 校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55

字数:923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6260-0 定价:11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内部发行)

ISBN 978-7-01-006260-0



9 787010 062600 >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

主编

A. H. 雅科夫列夫院士

编辑委员会：

A. H. 雅科夫列夫（主任）

E. T. 盖达尔 B. П. 科兹洛夫 B. A. 马尔丁诺夫

C. B. 米罗年科 B. П. 纳乌莫夫 E. M. 普里马科夫

A. H. 萨哈罗夫 Г. H. 谢沃斯季亚诺夫 H. Г. 托米林娜

C. A. 菲拉托夫 A. O. 丘巴良 A. A. 雅科夫列夫

本卷编辑出版委员会：

В. П. 丹尼洛夫 О. В. 赫列夫纽克 А. Ю. 瓦特林 (以上为主编)

**М. С. 阿斯塔霍娃 Г. В. 戈尔斯卡娅 И. М. 扎科莫尔基娜
Е. Е. 基里洛娃 Л. П. 科舍廖娃 В. С. 列瓦诺维奇
Л. Н. 马拉申科 Н. В. 穆拉维约娃 Л. А. 罗戈娃娅
Н. А. 西多罗夫**

**赵永穆 郑异凡 李铁军 徐燕霞 译
朱文佩 校**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翻译出版委员会：

主 任：李铁映

副主任：戴秉国、李慎明、李静杰（常务）

委员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钊贤	王钢华	乌传袞	冯育民	李方仲	李京洲
李慎明	李静杰	汪 宁	郇中建	张达楠	赵永穆
赵仲元	赵国顺	徐 葵	黄书元	鲁 桓	戴秉国
魏 华	臧乐安				

卷 首 语

《20 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是迄今为止,俄罗斯整理出版的规模最大的历史文献集。收录的大部分文献,都是首次对外公布,内容贯穿俄罗斯 20 世纪特别是整个苏联时期的历史,涉及许多重大问题和历史事件,史料价值极高。

2001 年春,我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期间,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同志向我建议翻译出版此书,我表示赞成,并担任了翻译出版委员会主任。六载寒暑一挥间,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人民出版社及翻译出版委员会的同志,为本书的按期译成出版,承担了相当繁重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书的译者,多为我国著名学者和翻译家,正是他们经年的认真严谨工作,才使我们尽可能准确、全面地了解这部文献的内容。在此,我对他们创造性的劳动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表示崇高的敬意!

苏联史,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史;是人类第一次探索、寻求自身解放,实现人民国家的历史;是人类的极为宝贵的经验、史诗。人类这部遗产必须记取,并深入反复研究。

十月革命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响亮的一声号角,洞开了人类的眼界,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当然,这个历史探索是充满曲折、艰难、复杂,甚至严重的挫折或一时的失败。苏联在建立后 69 年解体了,倒下去了,但历史永存、精神永存!道不亡,理不失,历史将按自己的规律、道路走下去。潺潺细流,终将千回万转夺路归大海,这是自然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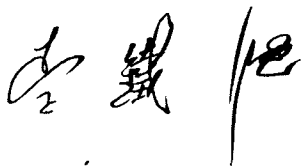
历史学是一门人文科学,研究历史资料,要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拔高一寸,不贬低一分,不涂抹一笔,不杜撰一字。只有这样,才能继承这笔精神遗产,把苏联史作为当代史来研究。

中国是史学大国,《史记》、《资治通鉴》等都是其经典著作。这些史学巨著为中华民族的传承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和脉络渊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目的都是要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人类发展的伟大探索。在这一历史探索过程中,汲取人类的历史遗产,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是必须的,也是走向未来的历史起点。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善学善为者史存焉!

史料是人类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的基础。这部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文献集,将为我国对俄罗斯特别是苏联历史的研究提供大量新鲜史料。但是,任何史料都会因编者的立场观点而存在局限性和倾向性,因此,在使用这些文献资料时,要对之加以分析和鉴别。

我建议这部史学巨著的翻译出版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斯为馨香以祝之!



2007 年 9 月 30 日

序

1929 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全会

1929 年冬春之际,联共(布)领导层内的冲突达到了顶点。“右倾分子”放弃了修改斯大林的多数派执行的方针的斗争,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政治纲领。迄今为止历史学家对 1928 年下半年至 1929 年初党内斗争情况的描述基本上是根据四月全会的个别参加者已经发表的讲话¹。斯大林的讲话只是在他去世前夕才发表,占去他的《全集》第 12 卷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²。速记记录中删去了斯大林对全会参加者插话的反应,因为它破坏了“右倾分子”遭到一致谴责的画面。布哈林的发言只是在为他恢复名誉之后,在 1989 年才得以发表,而且被删去了谈共产国际问题的部分³。

1928 年中央十一月全会只是在表面上缓和了斯大林集团同“右倾分子”的矛盾。同年底斯大林又采取了迂回行动,避开了政治局内的冲突,却安排在委托给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负责的部门中对他们的攻击。

1929 年四月全会上曾经宣布说,布哈林从休假回去后就忽视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这话不错,但是有一个例外,即 1928 年 12 月 7 日,政治局同共产国际的“俄国代表团”领导曾经有过一次非正式会见。这次会见的细节我们是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瑞士人洪别尔-德罗的回忆录中知道的。那天晚上布哈林和李可夫到柳克斯旅馆去找他,然后他们一起去了大剧院。剧院里正在上演歌剧《萨特阔》,但主要的活动发生在政府包厢里。洪别尔-德罗留在走廊里,他明白,如果布哈林在同政治局多数的争论中需要补充论据,就会来叫他⁴。

从参加会见的皮亚特尼茨基写的记录看,除了布哈林和李可夫之外,出席会议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鲁祖塔克、奥尔忠尼启则、雅罗斯拉夫斯基、什基里亚

托夫、洛佐夫斯基、希塔罗夫、古谢夫和库西宁⁵。通过的决议批准了对德国共产党内“右倾分子”的谴责,同时向台尔曼派的领导指出了在和“右倾分子”的斗争中所犯的错误,并确定了抑制德共内的调和分子的方针⁶。公开的冲突又一次暂时被推迟了。不过这次妥协也注定不会太久——12月11日皮亚特尼茨基通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说,“莫洛托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至今没有把关于德共党内右派的公开信起草出来”,他建议使用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准备的文件⁷。12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讨论德共党内“右倾”的会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出席了会议。在布哈林缺席的情况下,他的战友克拉拉·蔡特金和洪别尔-德罗试图坚持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紧急全会,但处境孤立。斯大林粗暴地指责洪别尔-德罗,称他是“心怀叵测的记者,为了替右派辩护,不惜诽谤共产国际”⁸。主席团的决议为台尔曼排除德共领导内所有不赞成他的政治路线的人开了绿灯。这实际上是用德国模式为日后联共(布)内粉碎“右派”做了一次试验。

斯大林马不停蹄地在各条战线上发动了攻势。12月10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工会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托姆斯基提出了更换领导的问题,重提自己辞职的想法。托姆斯基在四月全会上发言时,详细地讲了代表大会上他受到大会党团的压力,讲到莫洛托夫“突然”提议让卡冈诺维奇参加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等等。工会代表大会闭幕前夕,托姆斯基向政治局提出辞职的请求,但遭到拒绝。

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失去了实际领导的可能性,于是拒绝参与委托给他们负责的部门的工作。他们坚持要求尽快召开中央全会,以便向它陈述自己的观点。用托姆斯基的话来说,“两度推迟全会的不是我们”。可是斯大林并不急于开会,他要等待有利的时机来进行政治局内的决战。1929年1月10日,政治局再次要求托姆斯基回到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去工作。作为回答,托姆斯基于1月14日给全体中央委员送去一份声明。他详细介绍了工会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并坚持自己的辞职(见补充材料4)。布哈林也准备了类似的文件,不过在1月30日才交到中央委员会(见补充材料5)。据认为,这次拖延不仅是由于布哈林历来不愿参与权力之争,而且因为他要在1月21日做《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报告。他于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日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做了报告,与会的有高层领导,包括政治局委员。此外,报告刊登在所有的中央报纸上。布哈林首先从同农民的关系的角度谈了列宁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计划和意义。从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大林的领导所执行的方针越来越背离“列宁

的遗嘱”⁹。布哈林最后一次公开做的正式报告,其社会意义在于国内形势证实了“右倾分子”忧心忡忡的警告。布哈林实际上公开宣布了党内斗争的内容,而这正是斯大林的领导极力想要掩盖的。

粮食采购再次失败了,南方的歉收使局势更加严重。农民不愿意按压低了的价格出卖粮食,于是政府又一次采取了非常措施。城市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越来越经常地出现中断;人们整夜排队;罢工事件日益频繁。为了避免事态失控,地方政府自发地实行了配给制。1929年2月14日,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在全苏联推行了配给制¹⁰。

联共(布)中央收到的材料表明,被制度认为是自己的社会支柱的工人中不满情绪在增长。受困难的影响,党组织内也出现了动荡。1929年初,中央委员会的一名主任巡视员到了乌拉尔的下塔吉尔区。他报告说:“支部里都认为,右倾在于他们要求给工人供应充足的面包。”《乌拉尔工人报》的记者报道了工人的看法:“应当来一次新的革命,”“何必既折磨了农民,又折磨了工人?”“我们非常清楚,李可夫同志、加里宁同志和伏罗希洛夫同志是站在农民这边的,为什么不让他们讲话呢?”¹¹。

社会一政治问题的尖锐化当然并不能保证“右倾分子”取得胜利,但是却使政治局内的冲突不可避免地要继续下去。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莫斯科托洛茨基分子的一张传单,上面登载着布哈林同加米涅夫1928年7月11日的谈话(见补充材料1),——这对斯大林及其同伙是再好不过的礼物了。半年前的这件事把就各种日常实际问题进行的争论推到次要地位。政治局内的斗争具有了另一种性质和另一个方向。

迫使布哈林走出同一个原反对派分子接触这一步的原因,很难从政治逻辑方面加以说明——这很可能是绝望的一步棋,因为他力求不使“右派”昨天的敌人和今天的敌人组成统一战线。加米涅夫当即做了谈话(实际上是布哈林的独白)记录并送给了自己的同伙、当时在卡卢加的季诺维也夫。后者的反应是:政治局出现了分裂,眼下不要采取任何行动;要等待斯大林派人来把我们召回去;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同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合作(补充材料18,季诺维也夫1928年7月13日的信)。

托洛茨基也持同样的立场,他得到布哈林同加米涅夫会见记录的副本大约是在11月¹²。这份记录最终落到托洛茨基手中是经过加米涅夫的秘书施瓦尔贝。施瓦尔贝把这份材料给了自己的兄弟,他兄弟又给了托洛茨基分子尤戈夫。尤戈夫立即安排把材料转送到阿拉木图。公布这份笔记的意图似乎在于彻底打

消斯大林分子同“右倾分子”和解的念头。托洛茨基分子用《党被蒙上眼睛带向无底深渊》为名发了一份传单,公布了布哈林和加米涅夫谈话的记录。传单的注释积极地评价了联共(布)业已开始的向左的转变。

这里叙述的“托洛茨基分子传单”的出笼经过得自1930年7月阿格拉诺夫对政治保卫总局在押犯审讯的供词(见补充材料16及17),以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受到恢复党籍的“奖励”后的信件(见补充材料2、13及18)。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指出的“传单”内容上的“怪事”和下述事实:任何地方都不曾散发这份传单,但它却在1929年1月23日,即在布哈林做《列宁的政治遗嘱》报告后的第三天,就到了奥尔忠尼启则的手里(见补充材料5及6)。

“托洛茨基分子传单”的出现使斯大林可以把自己打扮成因布哈林的不忠而受了委屈的样子,指责“右倾分子”违反了党纪并转入决定性的进攻。1月23日,奥尔忠尼启则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审问了加米涅夫,加米涅夫承认了7月间同布哈林谈话的事实并确认了他的笔记的真实性。稍后,参加了7月11日会见的索柯里尼柯夫也做了类似的声明。1月24日以后政治局会议上两度提到这个问题。斯大林利用了布哈林和托姆斯基退席以示抗议的机会,通过了1月30日召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的决议。实际上这就类似于同反对派斗争时期用过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1月30日会议的速记记录用专门的简报——所谓“红皮书”——分送给了党的高级干部¹³。

1月30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详细介绍了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的谈话,强调他们秘密筹组反对派。布哈林承认同加米涅夫见面的事实,也承认笔记中叙述的某些会见情节属实。但是,布哈林说,就整体而言“这份文件是不正确的和虚假的”。1月30日,他不是局限于替自己辩护,而是发表了一篇详细的声明(见补充材料5)。布哈林声明的核心是坚决反对破坏“集体领导”的党内体制;制定党的路线不是根据正式的文件,而是依据安插“政治委员”的斯大林的书记处的指示;结果是“降低了政治局的作用”和共产国际中出现的“叫喊和强制”。在经济困难达到顶点、粮食匮乏、出现外国武装干涉危险时,国家领导应当表现出“最大限度的深思熟虑”,然而却“用党的拳头替代了思维的功能”。布哈林也和托姆斯基一样,声称看不出“长期战争”和“无休无止的吵闹”有什么意思,所以再度请求辞职。

但是布哈林1月30日的声明和后来2月9日“三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声明中的主要问题不是政治局内或共产国际内的关系,也不是斯

大林式的领导方法本身。布哈林坚决反对斯大林的政策,反对它的实质。声明说,这个政策的核心是斯大林 1928 年 7 月在中央全会上宣布的“贡赋的口号”^{*}。布哈林把这个口号的含义解释为“对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这从理论上和政治上说都是有根据的。的确,从独立的生产者手中用强制(直至使用武力)收购和课以重税的办法拿走产品,——对这种制度不可能有别的称谓。布哈林断言:“贡赋是和社会主义建设毫无共同之处的范畴。”(见补充材料 5)这个原则性的评价在三人的声明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贡赋是剥削者经济的范畴。如果农民支付贡赋,这就是说,农民是进贡者,是被剥削和受压迫的人,就是说,从国家的观点来看,他不是公民,而是臣民。”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不仅“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等同于剥削者类型的关系,而且采取了最残酷的剥削方式(‘贡赋’)”。(见补充材料 10)

布哈林和他的拥护者懂得,在工业化时期,农民必然要多付出一些来支持工业——“这可能还要继续相当长的时间,不过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来迅速消除这种状况”¹⁴。三人声明中提到列宁把农村为城市承受的负担界定为应当归还的“借款”、“贷款”¹⁵,坚决否定了贡赋制度。他们问道:“农民对工业建设的共同参与难道可以用贡赋来表示吗?”他们回答说:“这是胡说八道,文不对题,而且在政治上是危险的。既然把中农看成进贡者,那还能搞好同他的联盟吗?……既然从贡赋的角度看问题,那当然无需注意课税的分寸,以及对农村的供应等等。”声明说,贡赋的口号是要使非常措施“在意识形态上永久化”。

三人声明对斯大林的农民政策的总评价是毫不妥协的。他们断言,“贡赋”口号的实质“……在于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社会关系做了不正确的、反列宁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评定”,将导致危害极大的后果。他们的主要结论是:“执行‘贡赋’和‘向小农和小小农生产进攻’的方针,这种生产就不能健康发展,可是那样一来就不会有粮食,也不会有工农联盟了。”(补充材料 10)到 1929 年初,前者和后者都成了事实。

^{*} 1928 年中央七月全会取消了非常措施,肯定了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而斯大林却又在会上宣布向农民征收“贡赋”的口号值得特别注意。在布哈林发言之前,斯大林做了主要发言,其中并没有任何关于“贡赋”的暗示,相反,对于在新的粮食采购活动中取消非常措施表示十分同意。必须向农民征收“贡赋”来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斯大林是在全会的一次会议上讲话时宣布的(参见本书第 2 卷)。在取消非常措施的情况下,说应当向农民征收“某种类似贡赋的东西”可以被理解为只是斯大林的一种习惯用语。但是 1928 年中央十一月全会后立即恢复,而且明显地逐步加强了非常措施,迫使“右倾分子”声明自己对“贡赋口号”的态度。

1月30日和2月9日的声明都谈到“实际上消灭了中央的集体领导”,“党的官僚主义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实际上剥夺了党章赋予党员的党的权利”,谈到斯大林作为总书记的“无边权力”,列宁认为这是最大的危险,而如今它却“变得更加无边”。声明警告说,存在着把斯大林的立场同中央和全党的立场混为一谈的危险。三人声明中说,由斯大林亲自起草并提交2月9日会议的、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草案“一再把斯大林和党放在等值的地位上,甚至直接用中央委员会代替斯大林同志,也用斯大林同志代替中央委员会”。(补充材料5和10)

最后,两个声明都像1928年中央十一月全会之前一样,要求辞职或是调任其他工作。这不是在统治阶层和集团中常见的那种耍手腕或是捉迷藏游戏。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坚决要求辞职是,第一,抗议“恶意攻击,败坏名誉,组织包围”的完全自然的形式,其次,捍卫自己立场的最后手段。然而斯大林集团还没有下定决心让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辞职,因为距离处置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物集团太近了,不便处理另一个集团。还需要使党的基本领导层相信布哈林的“反党行为”,粉碎最高领导层中“右倾分子”的反抗。

本卷公布的1月30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的材料表明,这是怎样做的。斯大林的讲话特别值得注意,它是一份十分粗暴的起诉状。“招摇撞骗”、“卑鄙”、“拙劣的诽谤”一类的词汇同“布哈林发疯了”等断言交织在一起。(补充材料7)难怪它在收入领袖的《全集》时作了彻底的修改¹⁶。讲话的基调是“右倾分子”对国家正在经历的危机感到高兴,想利用它来撤换党的领导。

根据斯大林的提议,决议的起草交给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其成员有:奥尔忠尼启则(组长)、基洛夫、科罗特科夫、鲁祖塔克、斯大林、雅罗斯拉夫斯基。对布哈林做了说服工作,让他参加这个小组。他的反应(“如果你们像当年对待托洛茨基那样提出问题,那好吧,我参加小组”)表明,他记得同以前党内反对派的斗争伎俩,也很明白现在这套伎俩要用来对付他本人了。最后,斯大林坚持要把自己最亲密的伙伴莫洛托夫拉进委员会。

布哈林并没有参加关于加米涅夫同布哈林会见一事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29年2月6日下午3点在斯大林办公室举行了委员会的决定性会议¹⁷。会上向布哈林提出了貌似温和的和解方案¹⁸。这份文件建议,如果布哈林承认错误,放弃1月30日的声明,停止对《真理报》和共产国际的抵制,回到“政治局内同心协力工作”,那他和加米涅夫的这段事情就“一笔勾销”。这仿佛是要让布哈林本人来选择是战还是和,是同意又一次讲和,或是在政治局多数规定的阵地上

接受挑战。斯大林这次出人意料的“退却”原因何在呢？可能只是为了储备一份能证明斯大林喜爱和平的文件。决非偶然的是：这个方案在四月全会上曾经两次被全文宣读，而且是在两个主要起诉人，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斯大林，的发言中。

也不能排除斯大林试图把布哈林同他的伙伴们脱开，利用他同加米涅夫谈判的事实“挤压”他。但是斯大林的打算没有成功——布哈林拒绝停止对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的抵制，却提出了他自己的和解幻想：给他四个月的考验期，其间他将只研究理论问题。显然，在这个时期内斯大林派应当表现出“同心协力工作”的意愿。后来，在准备四月全会的发言时，布哈林写道：“我不会为了政治局中的座位而出卖自己的信仰。”¹⁹

布哈林拒绝放弃1月30日的声明，拒绝脱离自己的同伴就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实行非和解方案。随即出现了重大而严厉的另一个方案，不是和解方案，而是斥责“右倾分子”的方案。2月6日奥尔忠尼启则把这两份文件分送给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并注明布哈林不同意和解。和解方案不同的是“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草案指向的不是布哈林一个人，而是政治局里的所有三个“右倾分子”。“右倾分子”感到这份文件是斯大林的主意，称它为“歼灭战文件”。受到指责的不仅是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的会见，而且有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向党隐瞒了这件事情。列举了“替联共党内和共产国际内的右倾分子作外交辩护”的种种事情，但其中有许多（同意弗鲁姆金的信、反对将布兰德勒和塔尔盖默集团开除出德共）是十分可疑的。

决议的起草者们使出了党内斗争的惯用手法，抬出了足以“摧毁”论敌的列宁的文字。针对布哈林关于“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的论点，决议草案宣称：“右倾分子”攻击党的基础，宣传“由各个封建王国，例如《真理报》王国、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王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王国、交通人民委员部王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王国等等堆积起来的不定型的東西”。这些论据对习惯于硬性的垂直联系的党的机关产生了很大影响。斯大林及其集团用加速向社会主义前进来掩盖自己背离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和同农民的结盟，却反而指责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脱离了党的路线，而“爬”向右边。

联共（布）中央总书记在四月全会的讲台上谎称“右倾分子”以宣战回答了和解的建议。其实，他们2月9日的联合声明（补充材料10）是在他们看到了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详细的决议草案之后才出现的，这份草案使人毫不怀疑：镇压已经开始，它的第一步就是开除出党的领导机关。至于它的含义和

做法,只消看左翼反对派的经验就明白了。

从一些间接资料可以看出,2月9日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讨论并没有使力量配置发生什么变化,而且在许多方面预示了1929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进程。代表“右倾分子”发言的是李可夫。他集中谈了同农民“破裂”的问题,以及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中的不健康制度。斯大林本人又一次回答了反对派(补充材料12),他称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声明“基本上是反对中央路线的纲领”,而且重申他们对日益扩大的危机感到高兴,想借此确立自己的方针。不过这一次的主要结论却是针对个人的:“所以,问题在于无论如何都要把斯大林排除出政治局”。斯大林在结束讲话时,答应在即将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提出辞职。斯大林的这个声明只不过是玩弄手腕,目的在于把自己打扮成“右倾分子”横行霸道的受害者。这种狡猾手段是斯大林棋局的组成部分,指望吸引并控制政治局的多数,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同“右倾分子”斗争的结局。斯大林为了把党的最高级领导人拴在自己身边,使用了各种方法——多年合作和私交(如莫洛托夫),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同政治局其他委员之间因为职务关系而发生的冲突(例如,李可夫同伏罗希洛夫由于军事预算而产生的不和)等等。可以有根据地认为,斯大林使用了讹诈手段,迫使一些政治局委员就范。

从1929年2月起,政治局内出现分裂的信息就日益频繁地传到各地,搅动了党员群众。斯大林派的成员在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积极活动,大肆渲染“右倾危险”。在莫洛托夫领导下的中央书记处则安排各地做出相应的决议,准备在四月全会上加以利用。“基层”一如既往,走在“上层”前面。联共(布)维堡区组织要求清除不单是“右倾分子”和“调和分子”,还有“动摇分子和犹豫分子”。而且这些行动和声明并不都是中央机关采取组织措施的结果。斯大林不仅制造,而且能够把握党的官员和党员积极分子的情绪。这些人仍旧按照内战时期那种绝对命令的方式思维:富农是敌人,必须彻底打倒。对于必须加速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理解各不相同:一些人建议对现代化的前景做谨慎的探索,另一些人则回到了“最后的决战”。在布哈林准备四月全会发言的草稿里保留着这样一句话:“多数人的策略方针是‘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完了,需要另一个(斯大林和米高扬的)新经济政策。”²⁰

在苏联加紧迫害“右倾分子”的同时,在国际上也没有放松。和德共同时,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国共产党里也发现了“右倾”,后来这份名单还要延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在开除外国共产党员中的“右倾分子”,而联共

(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则在清除它的机构中布哈林的拥护者。

离开了共产国际和工会的战线之后,“右倾分子”在四月全会前夕,在政治局内进行了后卫战。他们拒绝支持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3月26日起草的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答复,因为它会助长对“右倾”的新议论。由此产生了政治局4月1日的信中对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错误的新“解释”(补充材料13、14)。4月10日,李可夫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向中央送去了供即将召开的党代表会议审批的五年计划提纲草案,坚持各经济部门的增长要保持平衡,规范市场关系并放弃非常措施。斯大林派的立场由米高扬负责陈述,他没有忘记1928年七月全会前夕他提出的粮食采购决议草案被“右倾分子”彻底修改的难堪。²¹

苏联政府主席及其政治伙伴力求保留新经济政策的框架,米高扬却把这种努力说成是回到1921年去,是替“资本主义市场”翻案。他说,提纲草案把经济的实际情况描绘得一团漆黑,说提纲没有讲到交通、合作化、培养新干部等等问题。米高扬声称,李可夫的出发点是布哈林“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²²。作为回答,布哈林4月12日给米高扬送去了一张尖刻的纸条:“既然你在对李可夫同志的五年计划提纲的‘评论’中说到布哈林‘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给这些词加了引号,我请你回答,你是从我的哪本著作中引用的这些词。我认为,你知道各种标点符号的使用规则,也知道文学—政治礼节的起码规则。”²³然而问题早已不是“文学—政治礼节”了。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在政治局拥有多数,他们准备了自己的五年计划提纲。在政治局4月15日审批提纲时,“右倾分子”投了弃权票。

第二天开幕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从讨论党内状况问题开始工作。雅罗斯拉夫斯基虽然有相当明显的倾向性,但是用词较为缓和,介绍了实际情况。不过他的“客观性”由米高扬、莫洛托夫和奥尔忠尼启则露骨的攻击性发言做了弥补。全会的导演工作完全掌握在斯大林派的手中,和“右倾分子”一致的中央委员为数不多,他们的发言被淹没在“总路线”的拥护者无休无止的声浪中。结果是全会拖得很长。甚至在同“联合反对派”斗争时期都不曾有过这样的事——用了8天时间,开了13次会讨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集团的问题。

大部分人的指控可以归结为:“右倾分子”看不见国内阶级力量的新变化,看不见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日渐增长和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必要性。每篇发言都根据布哈林关于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著名言论,喋喋不休地企图证明他们的纲领是小资产阶级的。在对党内情况的估计方面,给“右倾分子”扣上